

《大江东去》宋运辉形象的成长叙事

刘小微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大江东去》符合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特点,即:将人物的成长历程融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从个人命运的沉浮透视社会历史的变迁。宋运辉形象作为动态的统一体,在20年间的成长变化具有情节意义。社会历史作为人物成长的背景,对人物命运构成的压力和推动力成为审视和反思的对象,人物成长中的内心挣扎和觉悟,也构成小说探索的精神之维。宋运辉既完成了生存层面上对社会的适应和融入,也保留了精神上对世俗的质疑和抵抗,最终实现了成长过程中人格冲突的统一。

[关键词]《大江东去》;宋运辉;成长小说;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 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20)01-0077-06

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①曾获第11届中共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是第一部获得国家级主流奖项的网络文学作品^[2]。2019年10月又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办的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中,名列25部入选作品榜首。^[3]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也在2019年8月荣获第15届中共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4]《大江东去》以朴素的现实主义笔法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催人奋进、引人向上的积极意义。从小说内容和叙事特点上看,《大江东去》符合“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5]的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特点。笔者将从成长小说理论出发,对小说中的宋运辉形象加以解读。

一、成长小说的概念和美学特征

成长小说是源于西方的小说类型,其传统在欧美各国经历了三个世纪的迁徙流变已臻成熟,引入中国则迟至近代以后。成长小说形态内涵在

西方发展历史中丰赡复杂,其概念界定也成为颇富争议的理论难题。徐秀明曾对此做过详细梳理,概括出两大类别,即“理性判断类”和“形态描述类”。^[6]理性判断类以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为代表,认为“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7]形态描述类以威廉·狄尔泰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成长小说也就是讲述个体在‘内心自我’与‘外部规约’的激烈争夺中最终做出重大的人生选择、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小说。”^[8]巴赫金的成长小说定义描述并强调了成长小说的动态性特点,在国内得到普遍接受,“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共识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9]“人的成长”被巴赫金视为成长小说区别于其他类

[收稿日期] 2019-10-19

[基金项目]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博士科研基金社科类项目(C16025);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科研促进部项目(HX18003)

[作者简介] 刘小微(1973—),女,福建厦门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

① 笔者所引《大江东去》均出自阿耐《大江东去(全三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型小说的根本特征。徐秀明也归纳出西方成长小说特点的两大传统,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欧洲古典传统和以个体为本位、拒绝社会教化的美国现代传统。古典传统成长小说的成长主体最终会融入社会主流并获得自我认知。现代传统中拒绝社会教化的成长主体,最终往往无法融入社会实现成长,“以幻想开始,以幻灭结束”^{[6]85}。

综合而言,成长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大体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作为成长主体的主人公通常是未成年人或没有社会阅历的年轻人;主人公必须经历一些使他有切肤之痛的重大挫折;主人公的性格或世界观在成长中会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5]6}主人公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一个或多个引路人,从正面或者反面影响着主人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

二、宋运辉的成长

《大江东去》按编年顺序叙事,从1978年一直写到1998年,时间跨度覆盖了当代中国20年的社会变迁历史。小说主人公宋运辉生长在闭塞的乡下,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把握时机不懈奋斗,历经各种挫折磨砺,从一个不谙世事的17岁少年,逐渐成长为国企大厂的技术栋梁和实权派人物。小说把主人公从青涩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轨迹呈现得清晰、扎实、可信。

(一) 宋运辉的三次离家与自我认知发展

在成长小说的经典模式中都有主人公离家的环节,磨难与觉悟就发生在出走的过程中,出走是主人公实现成长的契机。《大江东去》也为宋运辉安排了三次离家的经历。与一般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宋运辉离家不是因为懵懂无知的莽撞或者迷惘,也不是被迫流离失所,而是他自己清醒的选择,虽然其中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无奈。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己行动的惟一指令者,并且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0]人的自由体现在选择中,选择意味着自我的存在。宋运辉三次离家的选择体现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第一次是初中毕业后去偏远山村支农,仿佛一个受难者;第二次是去读大学,如同一个重生者;第三次是去东海开发区白手起家建立新厂,俨然

一个破釜沉舟的创造者。三次离家所面临的困难一个比一个大,前景也一个比一个广阔、美好。当然,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一个比一个重大,对能力水平的要求一个比一个更高。这三次离家成为宋运辉世界观和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三个台阶,也是他成长路上的三个里程碑。

宋运辉第一次离家是为了换取读高中的资格。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宋运辉被剥夺了继续读高中的权利。听说参加支农后允许继续上学,便自愿下放到更偏远的山村去,一边喂猪一边刻苦自学。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宋家姐弟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双双考过了分数线,但录取时又被人恶意压制。极度悲愤中宋运辉情绪失控吼了父亲一嗓子,导致父亲羞愧自杀险些丧命。生死关头的强烈震撼中,宋运辉悟出一条刻骨铭心的道理——“人不能行差踏错。”(《大江东去》一)正如莫迪凯·马克斯指出的,“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影响。”^{[5]6}这次得到的教训成为他终身谨记秉持的处世原则。在日后的生活、工作中,宋运辉年纪虽轻,却作风老练,思维缜密,谨言慎行,尤其是在权利漩涡中能做到滴水不漏,让对手无懈可击。

宋运辉第二次离家是去上大学。走出乡村,新世界的大门向他一重重打开。从跳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宋运辉开始领悟到了“五湖四海”的意思。进了大学,这种领悟更为深刻。在这个大环境里,宋运辉的思维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个重大改变就是终于卸下了家庭成分的重负,因为他的家庭成分在他寝室八个人中,只能算是“小儿科”的。对于宋运辉的前途发展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精神顾虑解除了,他才敢于第一个申请加入共青团,申请做附小的辅导员;敢于去设想那些以前他根本没有资格去憧憬的未来。宋运辉的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培养了收存《人民日报》、关注国家政策动态的好习惯。从闭塞乡村走出来的宋运辉,刚进大学时根本听不懂别人讨论的政治话题,对比之下,后来那个有着敏锐的政策法规意识、纵观天下事、胸中装着国际格局的宋运辉简直是脱胎换

骨、判若两人。这个习惯使他受益终身，不仅给了姐夫雷东宝很多重要的帮助，也在自己事业发展的几个节点上能够高瞻远瞩，清醒决策。当然，宋运辉绝不是钻政策空子的市侩。四年的大学，宋运辉一寸光阴都没有浪费，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成绩一直保持名列前茅。他对自己的专业技术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在后来的工作中更是把忘我钻研、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发挥得淋漓尽致，被称为“累不死的宋运辉”。可见，宋运辉的成长形态既有顿悟式的突变，也有愚公移山式的厚积薄发。

宋运辉第三次离开的家已不是他的原生家庭，而是自己建立的小家了。出走东海建新厂，半是自愿半是被逼无奈。从宋运辉人生之路的整体角度来看，经历着艾布拉姆斯所谓的“一场精神上的危机”^{[7]218-219}，这一次离家全面开启了事业与生活的新起点。宋运辉是敏锐的，在金州化工厂长期的权力角逐中，宋运辉看清了很多官场中的真相、人心的黝黯与世情冷暖。他看明白了水书记为了自保，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同是一个阵营的卒子虞山卿和程厂长，想到自己在水书记股掌中的未来命运，不禁感慨“现在做得累死累活，实在是如转盘上的小白鼠，无意义得很。甚至，有些滑稽。他在实现他的理想，高位者却在利用他的幼稚。如果说人生还有‘幻灭’这么一种状态，他现在就差不多已经进入。”（《大江东去》一）但他仍然努力坚守着心中那份振兴金州、振兴中国化工业的伟大理想。宋运辉也是理智的。他很清楚理想之树要结出果实必须植根于现实的泥土中，他必须保住自己的领导权、话语权，这是他实现理想的保障。小说描述了宋运辉此刻剧烈的心理震荡。岳父的失势迫使他意识到“现在必须独立承担所有……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是一大家子老小，甚至包括程开颜的兄嫂。”（《大江东去》一）在这个顿悟时刻，宋运辉的心理角色从“儿子”一下子转换成了“丈夫”，整个大家庭的顶梁柱。他将由此真正“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和作用。”^{[7]218-219}芮渝萍认为，认知发展是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这些对主人公成长产生启发的事件，成为成长小说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叙事动力。”^[11]在一次次选择中宋运辉的自我认知

能力不断增强，不断走向成熟，小说情节也借此动力不断向前推进。

（二）宋运辉的四次婚恋与责任意识强化

孙胜忠曾引述杰罗姆·巴克利的观点指出：“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对生活的直接体验中‘至少包括两场恋爱或性的遭遇，一个粗俗沉沦，一个激越飞扬，并要求主人公在这个和其它方面重估其价值观。到他作出决定……那种他能够堂皇决定融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青春期，进入了成年’”^[12]。宋运辉的精神成长也体现在四次婚恋波折的抉择应对上。

宋运辉的初恋目标是金州厂图书馆的管理员刘启明。之所以会对刘启明暗生情愫是因为她的音容笑貌酷似姐姐宋运萍，他是把对死去的姐姐的感情寄托到了刘启明身上。显然，此时的宋运辉潜意识里还是个依恋亲人的大男孩。随着刘启明与虞山卿相恋，宋运辉这段一厢情愿的暗恋也就无疾而终了。

宋运辉的第一次婚姻带有一些“阴谋”的性质。“累不死的宋运辉”是金州厂公认的青年才俊，前途无量。程厂长的小女儿程开颜钟情于宋运辉，于是，程家全员上阵助力，最终通过造成舆论压力的手段促成了这桩婚姻。对于年轻的宋运辉来说，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去想像一下自己未来的婚姻，就已经懵懵懂懂地被安排进了生活程序中。这场婚姻见证了宋运辉从稚气未脱到成熟独立的过程。如果说当初程家是用“阴谋”把初出茅庐的宋运辉“安排”进这段婚姻，那么而立之年过后的宋运辉已完全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一旦做出选择便没有人能改变他、阻止他。无论是岳父曾经的提携之恩，女儿对母亲的依恋之情，或者程家人策划的舆论压力给他仕途发展造成的威胁，都不能撼动他的意志。最终，宋运辉同样用“阴谋”把程开颜退回了程家，稳稳当地离了婚。在这场离婚大战中，宋运辉头脑清醒，目标明确，策略周密，步步为营。我们看到了宋运辉的成熟，也不禁为他的冷酷、决绝不寒而栗。

离婚后的宋运辉没有如读者所热切期待的那样与灵动迷人的小女孩梁思申牵手，而是首先考虑到年龄相当、境遇相似的单身妈妈陶医生。人近中年的宋运辉此时已被生活磨砺得沉稳务实，

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比起甜蜜的爱情,更需要解决的是给女儿找一个好妈妈,给家庭安置一个妥帖的主妇,而年轻美丽的梁思申应该拥有更完美的爱人。幸而陶医生是位自尊、知性的女子,她看得出宋梁之间才是真正的心有灵犀,果断退出了他们的生活。

宋运辉与梁思申之间演绎的就是一个有情人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传统故事模式。他们亦师亦友。两人在十几年远隔重洋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彼此勉励,你追我赶地共同进步。虽一直没有相见,却早已心心相通,成为彼此的灵魂依托。一旦相见,那种默契所带来的心灵共振即刻化成无法抗拒的爱恋。但作为一个年近不惑的离婚男人,宋运辉表现出驾驭感情的理性。小说把宋运辉处理感情问题时的理性、克制拿捏得非常准确。他认为离异带着女儿的自己配不上优秀的梁思申,她应该有个年轻、有活力的男朋友。所以,当与那个看起来与梁思申更般配的情敌狭路相逢时,虽然痛到心在滴血,他还是隐藏住深情把梁思申推向了对方。好的爱情婚姻可以造就人。宋运辉对梁思申的爱已超越了利益得失和肉体占有的世俗之情,他在社会浸染中慢慢滋生的功利之心在这份真情的涤荡中获得了净化和升华。当然,小说没有让读者失望,最终在梁思申外公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建立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完美家庭。

(三) 宋运辉成长之路上的三个引路人

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一般都会遇到一个或多个引路人,他们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主人公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这些引路人“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正面引路人、自然神灵和反面人物。”^{[5]125}《大江东去》是现实主义小说,不存在自然神灵引路人。宋运辉成长过程中得到多位引路人的点拨,但是很难用正面、反面一言以蔽之。人是多面的,复杂的,他们在宋运辉的人生中起的影响作用也纷繁杂驳。

1. 姐姐宋运萍——带痛的推动力。小说中的宋运萍形象是个完美的人物设定,作者几乎把女性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宋运萍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弟弟的保护伞,爱护着他也管束着他。有姐姐在,宋运辉永远是个孩子,从这一点上来说,姐姐的存在对宋运辉的成长是一个阻

力。宋运萍生前对宋运辉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是她把家里唯一的上大学名额让给了弟弟。没有这次上大学的机会就没有宋运辉日后的辉煌,大学是他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也是宋运辉心中的痛点。如果姐姐不是这样地克己成全别人,如果上大学的是姐姐,她就不会嫁给雷东宝,就不会怀着身孕意外死亡。所以,宋运萍的死是宋运辉成长的一个转折点。姐姐离世后,宋运辉成了父母唯一的依靠,他必须在物质上、精神上都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姐姐一直活在他心里,是他成长的推动力。他第一次钟情的女孩音容笑貌酷似姐姐;他结婚后迟迟不敢要孩子,是因为心中一直有姐姐怀孕惨死的阴影;他努力为父母创造更好的生活,是要替姐姐多承担一份孝道。总之,宋运辉方方面面的生活中都有姐姐的影子,宋运萍是他努力向上的重要动力。

2. 徐县长——见证成长的镜像。小说中徐县长与宋运辉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但他却是打开宋运辉事业之门的一把钥匙。宋运辉大学毕业后能进入金州化工厂工作,是徐县长暗中举荐的结果。联结二人的纽带是宋运辉的姐夫雷东宝。徐宋二人常常通过给雷东宝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发生思想和碰撞,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和个性。小说中的宋运辉几乎就是年轻版的徐县长。从水书记的谈论中可知,宋运辉在金州的成长经历正是当年徐县长的成长历史的翻版。后来宋运辉开发兴建东海化工厂遇到阻力,又得到了已调回北京的徐县长的指导帮助。反过来,在徐县长身上,我们也仿佛可以看到宋运辉未来的影子。

3. 水书记——在拒绝中追随的向导。宋运辉成长历程中,水书记对他的影响作用最大,影响意义又最为复杂,很难用正面或者反面来简单评说。水书记有强大的权利操控能力,金州厂30年的绝对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他手里,即使已经退休了,余威依然令后来者不敢造次。宋运辉初来金州时非常反感水书记为首的这些官僚们的作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超然世外独善其身,事实上,他从一进金州的大门就莫名其妙地被裹挟进派系间勾心斗角的漩涡中。金州厂如同一个社会的缩影,个人命运在大环境中总是显得渺小。

水书记也并非仅仅是个弄权者，他对金州厂有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争权不只是为了夺私利，更是为了能够把控住金州的发展命运，不放心把金州交在不可靠的领导者手里。水书记很惜才，正如当年栽培徐县长一样，他也非常器重宋运辉的才干，愿意为他的发展指路、开路。从水书记这里，宋运辉明白了“因人成事，因人废事”（《大江东去》一）的道理，学到了很多官场中与人周旋的技巧。在东海新厂的权利争夺战中可以看到，宋运辉的铁腕打击力一点都不比水书记逊色。宋运辉已经逐渐明白世事没有两全，为了达到目的，总要向社会规则作出一定妥协。在渐渐接受了这些规则的过程中，他也正在慢慢变成水书记。恰如水书记常常感慨在宋运辉的身上看到了曾经年轻的自己——在涉世未深的时候都不屑于与世俗同流合污，对官场中的阴谋阳谋嗤之以鼻，但走着走着就抵抗不住逆流而行的艰难，逐渐忘记了初衷，迷失在世俗潮流的漩涡里。老去的水书记选择了顺势而为，年轻一代的宋运辉还没有完全被社会驯服，在他适时驻步反思的时刻，我们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希望。

三、宋运辉对成长的反思

作家梁晓声曾经用诗意的笔调盛赞过女人对于男人的影响力，他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世界。……好女人是一种教育。好女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清丽的春风化雨般的妙不可言的气息，她是好男人寻找自己，走向自己，然后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挠的力量。”^{[13]88}《大江东去》中的梁思申就是作者塑造的这样一个好女人的形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梁思申难得地保有一颗纯洁、正义之心。虽然有着显赫的家世和几乎可以所向披靡的社会关系网，却洁身自好，自己再怎么辛苦都不愿利用特权。她为没能及时发现、阻止父亲的堕落而痛心疾首，更不甘心眼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越来越坦然地接受名利场中的各种乱象，最终变成像水书记、像她父亲那样随波逐流的腐败官僚。她从小把志向高远、意气风发、自强不息的Mr. Song 视为心中的偶像和赶超的目标。这么多年来，他们比翼齐飞，相互勉励，她不忍心任由

宋运辉慢慢迷失了本心，与她渐行渐远。她想方设法地提醒、规劝着宋运辉，开诚布公地告诉他，自己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的性情中人。而宋运辉何尝没有感到迷茫和失落呢？

虽然随着阅历的增长，宋运辉在体制的复杂关系网中早已不再视水书记为“白脸奸相”，甚至“自诩水书记的嫡传弟子”，“极端推崇水书记的手段”（《大江东去》三），但他还没有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并不认同水书记的为人。与梁思申的讨论也非常触动他的心灵。可见，在宋运辉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另一个试图拒绝流俗的灵魂，只是它的声音被急于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遮蔽了。用梁思申外公的话来讲，宋运辉这些年工作环境太复杂，人又奔跑得太快，来不及好好地思考。在这一点上，宋运辉与中国飞速发展的社会状态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

幸而宋运辉遇到了一个散发着“清丽的春风化雨般的妙不可言的气息”^{[13]88}的好女人，竭力要唤醒他的初心，引他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敏锐的宋运辉也觉察到了梁思申情绪的异样，担心两个人之间爱的变化。他不想失去梁思申，他需要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于是，在八月的艳阳里，宋运辉和梁思申带着他们一双可爱的小儿女回到老家，重走当年的古栈道。当年宋运辉就是从这条路走出乡村，走进大学，开启他的人生之旅的。他们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仪式来找回初心，回归性情。他们就这样一路追寻，一路回忆，一路思考，一路交流，终于解开心结达成共识。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对个体人生的反思也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社会必须发展，发展会带来各种问题，需要不断反思，及时矫正。个人也是如此。作为觉悟者，他们要努力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时代里持守住本性，为儿女的未来守护住一个青山绿水的自然世界，更要守护住一个纯净、美好的精神世界。至此，宋运辉真正完成了他的精神成长。

综上所述，小说《大江东去》将人物的成长历程融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从个人命运的沉浮透视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既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色彩，同时也契合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定义，具有让“时间进入人物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

本身”^{[9]230}，从而将变动的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叙事形态。小说着力塑造了4个典型人物形象，分别代表着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这4个年轻人20年的成长历程，构成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变迁图景多面而立体的呈现。宋运辉形象既是联结4个人物的枢纽，也是小说透视国企改革改革的窗口。作为“动态的统一体”^{[9]230}，他在20年间的成长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9]230}。社会历史作为人物成长的背景对人物命运构成的压力和推动力成为审视和反思的对象，人物成长中的内心挣扎和觉悟，也构成小说探索的精神之维。宋运辉既完成了生存层面上对社会的适应和融入，也保留了精神上对世俗的质疑和抵抗，最终他与梁思申对于社会问题和自身发展问题达成共识，标志着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冲突获得了统一。小说人物的成长之路也是中国新一代社会精英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之路。中国社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矛盾，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停滞不前。经济发展会带来视野的开阔，随即带动思想的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会在反思调整中慢慢修正改善，推动社会走向更高更远。

[参考文献]

[1]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2010)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1: 580.

- [2] 黄平. 网络文学二十年及其走向——以“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榜单为样本 [N]. 人民日报, 2018-04-20 (24).
- [3] 鲁大智. 《大江东去》等网文佳作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 [N]. 中华读书报, 2019-10-24 (11).
- [4] 新华社.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N]. 人民日报, 2019-08-20 (4).
- [5]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6] 徐秀明, 葛红兵. 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与中国衍变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82-93.
- [7] 艾布拉姆斯. 欧美文学学术语词典 [M]. 朱金鹏, 朱荔,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8] 徐秀明. 成长小说概念厘定与类型辨析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124-127.
- [9]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 [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10] 萨特. 存在与虚无 [M]. 陈宣良, 等, 译. 林小真, 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11-125.
- [11] 芮渝萍, 范谊. 认知发展: 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 (6): 29-35.
- [12] 孙胜忠. 在情爱中成长——作为成长小说的《小城畸人》 [J]. 国外文学, 2010 (3): 124-130.
- [13] 梁晓声.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致妻子的一封信 [J]. 半月选读, 2009 (18): 88.

On the Growth Narration of Song Yunhui's Image in the Novel *The Great River Goes East*

LIU Xiao-wei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River Goes East* conforms to the narrative mode of Bildungsroman, that is, integrating the growth of character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seeing through the vicissitude of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ividual destiny. As a dynamic unity, Song Yunhui's growth and change in the past 20 years is of plot significance. Social history as the background of characters' growth, the pressure and driving force of characters' fate become the object of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The inner struggle and consciousness in characters' growth also constitute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novel exploration. Song Yunhui not only completed the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 on the survival level, but also retained the spiritual questioning and resistance to the secular world. Finally, the unity between growth and “anti-growth” was completed.

Key words: *The Great River Goes East*; Song Yunhui; Bildungsroman; narrative pattern

(责任编辑 林 芎)